

# 從溪口到臺北： 第三次下野期間蔣介石的抉擇

林 桶 法

## 摘 要

民國以來蔣介石三次下野，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被逼不得已引退，都回溪口鎮老家，都對局勢的失敗作檢討，也都強調：希望作長期的準備，以求革命之根本解決，最後都得以重掌政權，但同中有異，心境不同，時局不同，發展結果也不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第三次的下野，此次下野，蔣雖引退，但仍具有國民黨總裁之職，自其回溪口後，幾乎每天訪客不斷，對於來訪黨政軍要員的請益，蔣也都給予若干的指示，名為下野，實際上仍是權力的實質領導者。

蔣回老家一方面固不忘情於國事，但也重視家庭生活，遊歷各處，享受天倫之樂，與鄉親的互動良好，關心修族譜與閱讀也是其生活的重點。

由於李宗仁推動與中共的議和，並沒有得到預期成果，共軍決定渡江，蔣於4月24日離開溪口，往上海及定海附近，最後來臺，其來臺並非倉促決定，早在下野之前即以上海、重慶、廣州、臺灣為重點地區，並早作佈署，臺灣雖非惟一的選擇，卻是最重要的選擇，由於臺灣隔海較容易防守、中共潛伏者較少，因此先將黃金、故宮博物院之重要文物遷來臺灣，安排陳誠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之位。杭州會議之後，在陶希聖、陳誠等人的建議下，加以李宗仁一再逼其釋權、出國，蔣乃毅然決定來臺。因此，與其說蔣來臺是局勢所逼，倒不如說是蔣在1949年所作的最重要的選擇。

關鍵詞：蔣介石、臺北、溪口、下野、陳誠

## From Xikou to Taipei: Chiang Kai-shek's Alternative during His Resignation from the Presidency in 1949

Lin Tung-fa \*

### Abstract

Chiang Kai-shek resigned from his post as national leader three times during his lifetime. Every time he was forced to give up his post. Then he came back to his hometown Xikou and made self-criticism about his failure. He emphasized on a long-term preparation in order to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revolution. And finally he regained his power as a national leader. After his third resignation from the presidency in 1949, however, Chiang still acted as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Kuomintang Party. At Xikou he received guests almost everyday and gave instructions to senior party cadres. Despite he quit his post, Chiang still enjoyed real power as a national leader.

Though Chiang is concerned about national affairs at his hometown, he highly valued his family life. He took trips at local areas and had lots of fun with his families. He had amicable interactions with local people.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mpilation of his family pedigree and reading books also became the center of his life.

Li Zongren's negotiation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as doome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ecided to move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 On April 24, 1949, Chiang left for Shanghai. Then he went to Dinghai and Taiwan. Before his resignation Chiang had already carried on military deployment in Shanghai, Chongqing, Guangzhou, and Taiwan. Though Taiwan was not Chiang's sole alternative, i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The Taiwan Strait could be an effective defensive line for Taiwan. So Chiang had already moved gold reserves and treasures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o Taiwan. He had also assigned General Chen Cheng to be the governor of Taiwan. Chiang's coming to Taiwan in 1949 was not so much with some reluctance as of his own most important choice.

**Keywords :** Chiang Kai-shek, Xikou, resignation from the presidency, Chen Cheng.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 從溪口到臺北： 第三次下野期間蔣介石的抉擇\*

林 桶 法\*\*

## 一、前 言

民國以來蔣介石三次下野，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被逼不得已引退，都回溪口鎮老家，都重新掌控政權，但同中有異，心境不同，時局不同，發展結果也不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第三次的下野，此次下野，蔣雖引退，但仍具有國民黨總裁之職，自其回溪口後，幾乎每天訪客不斷，對於來訪黨政軍要員的請益，蔣也都給予若干的指示，許多的研究者大都關注於蔣如何操控政局，干預李宗仁的主政權，對於其生活部分則大都流於小說情節，缺乏嚴謹的探討。<sup>1</sup>本文參酌國史館典藏《蔣中正總統檔案》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6年10月1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12月26日。

\*\*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sup>1</sup> 有關蔣介石第三次引退後，至奉化溪口的專文及專書就有王泰棟、羅岩：《武嶺夢殘：蔣介石在大陸最後日子》，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年；胡薛軍：〈蔣介石在南京淪陷前後〉，《春秋》，第6期（1985年）；秦棟等：〈殘局難收—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日子〉，《名人傳記》，1986年第6期及1987年第1至2期；秦彤等編：《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時刻》，海口：南海出版社，1992年；郝堅編著：《蔣介石逃往臺灣的前前後後》，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華文出版社編：《四窗巖尋夢—蔣介石第三次下野》，北京：華文出版社，1998年；劉維開：〈蔣介石第三次下野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2000年6月）；琚忠友：〈論蔣介石在歷史上的第三次下野〉，《南京政治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郭寶平：《蔣介石三次下野秘錄》，北京：中國檔案館，1995年；張明鎬：〈蔣介石在溪口〉（上、下），《傳記文學》，第71卷第5期、6期（1997年11月、12月）；卞杏英：〈淺析蔣介石三次下野的緣由〉，《上海師大學報》，1990年第1期；高曉星：〈蔣介石在南京三次下野的情況是怎樣的〉，《歷史教學》，1983年第9期；陸仰淵：〈蔣介石三

中的《事略稿本》、《革命文獻》、《特交文卷》、《特交文電》等檔案、秦孝儀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及蔣經國的若干資料，希望藉此瞭解蔣第三次下野後在溪口的情形及來臺的原因與籌謀。

當國共內戰時局漸不利於國民黨之際，臺灣是不是蔣的惟一選擇？對此探討者都以後觀之見，認為臺灣當然是蔣轉進的重要根基地，而且是早在下野之前就預定好，當時情形是否如此，有待討論。當三大戰役漸不利於國民黨之際，即有人討論到遷都的問題，1948年11月，蔣否認有遷都的必要，董顯光則在1949年12月從蔣的安排中，深知中國大陸萬一發生意外，臺灣省可為政府最後堅守力圖復興之地，<sup>2</sup>1949年1月初蔣仍認為固守南京之重要，1月17日寫信給其妻宋美齡時再度表示：「政府決不遷臺，兄亦不即刻赴臺。」<sup>3</sup>選擇臺灣作為根據地到底是何時作的決定？為什麼選擇來臺而沒有選擇抗戰時期的重慶？值得探討。

## 二、溪口歲月一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 1. 訪客絡繹不絕

民國時期蔣介石三次下野，簡單列表如下：

蔣介石民國以來三次下野比較簡表：

---

次引退》，《民國春秋》，1988年第2期等。這些專文或專書，除劉維開等少數學者較具學術價值之外，其他都是野史、傳說之類，較不嚴謹。

<sup>2</sup> 董顯光：《蔣總統傳》（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41年），頁510。

<sup>3</sup> 《蔣總統家書—蔣致夫人書信》，第3冊。（《蔣中正總統檔》，國史館藏）

	第一次下野	第二次下野	第三次下野
下野時間	1927,8.15-1928,1,7	1931,12,15-1922,1,29	1949,1.21-1950,3,1
下野身分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國民政府主席、陸海空軍總司令、行政院長。	中華民國總統、國民黨總裁（未辭）。
停留時間	1927,8,14-9,22	1931,12,22-1922,1,13	1949,1,21-4,24
下野原因	北伐期間，處理中共問題，被逼。	日本侵華，蔣對日政策不為國人所見諒，被逼。	國共三大戰役國軍失利，為處理和談問題，被逼。

三次下野有許多相似，都回老家溪口鎮，等待時局的變化，有許多的場景極為相似，遊歷的地區，甚至絡繹不絕的賓客都有若干的重複，第一次下野與第三次下野的時間相差二十二年，年齡從四十一歲的中年到接近老年的六十三歲，第一次下野自認為：「此次引退，比較心氣和平，毫無怨尤。以心地光明，良知無咎也。」<sup>4</sup>第二次下野，有夫人宋美齡陪行，心境平和，談到：「然出京回鄉，更覺樂趣盎然。」<sup>5</sup>第三次下野強調：「在故鄉遊覽山水，為平生最樂之事，尤其在戰塵瀰漫中引退之時，更覺難得，而其樂亦無窮。」<sup>6</sup>三次下野都對局勢的失敗作檢討，也都強調：希望作長期的準備，以求革命之根本解決。第三次下野失落感更重，更懂得珍惜與鄉親及親人相處的時間，第一次在掃墓後會客甚久，頗以為苦，曰：「如何使人不來擾我。」<sup>7</sup>第三次下野在2月5日與蔣經國、蔣孝文遊育王廟，同行者尚有陳立夫、張道藩、谷正綱、陶希聖、石覺、李文、袁樸等，回家途中民衆夾道歡迎，蔣嘆曰：「鄉人熱情如此，未知將何以為報。」<sup>8</sup>其中第三次下野最值得探討。

1949年1月21日，蔣於黃埔路官邸召開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宣布引退文告，隨即吩咐離開事宜，下午四時乘機離開首都南京，飛往杭州，

<sup>4</sup> 《事略稿本》（一）（臺北：國史館，2003年），頁680。（《蔣中正總統檔案》）

<sup>5</sup> 《事略稿本》（十二）（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480。（《蔣中正總統檔案》）

<sup>6</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2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7</sup> 《事略稿本》（一）（臺北：國史館，2003年），頁702。（《蔣中正總統檔案》）

<sup>8</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駐筲橋空軍學校；晚間，同蔣經國及部屬在樓外樓吃飯。回校後，張羣由南京來電話，告知李宗仁認為宣言中以中常會改正之點，未明出處，須加修正，並將蔣手擬訂之「既不能貫徹戡亂政策，以奠定永久和平」數語，一併刪去。蔣對於李的態度雖感不快，但既已決定下野，細節只得牽就。蔣介石夜宿空軍學校的天健北樓，蔣經國隨侍左右。睡前，蔣告訴蔣經國說：「這樣重的擔子放下來了，心中輕鬆得多了。」不管這是否是其肺腑之言，但至少能遠離三大戰役之後常被逼迫與指責的窘困，的確是一種解脫。22日上午，蔣乘機離開杭州抵達寧波櫟社機場，再乘車回到奉化溪口。

返溪口後，總統府侍從室（1948.5.20成立）員額縮減，侍衛長石祖德，副侍衛長樓秉國、俞濱東，侍從武官周書麟、夏功權，侍從秘書周宏濤、曹聖芬，<sup>9</sup>負責安全及聯絡工作。其他還有一些核心人員，如余濟時將軍、周菊村參謀、于豪章參謀、熊官丸醫師等隨從到溪口。

自引退回故鄉至4月24日離開奉化，三個月內，先後會晤許多重要幹部，如附件一，從其中可以分析如下：

其一、雖然蔣離開總統的職位，但他仍是國民黨的總裁，具絕對的影響：重要黨政幹部仍以蔣為馬首是瞻，遇有重要問題相繼前往請益，幾乎每天都有訪客，有時最多一天接見九人，這些人不僅是行禮如儀，少則晤談一小時，多則三、四小時，接見訪客成為蔣引退後的主要生活。

其二、訪客包括黨政軍要員，以蔣的親信部屬如湯恩伯、吳忠信、張羣、陳立夫、王叔銘等較多，其他非嫡系如西南軍系等甚少到此請益。即使要求前來，大部分遭婉拒，如不請自來者，也在邀宴後離開。對此司徒雷登（John Stuart Leighton）談到：

在同一時候，住在故鄉的蔣總統有祕書、警衛、長途電話及其他設備來處理職務，晉見的人絡繹不絕。田園詩似的詞句描寫

<sup>9</sup>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蔣公侍從見聞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6年5月），頁202。



他如何徜徉山水之間，訪問鄉間和善父老，逗著幼孫遊戲，並享受古代式的田園退隱生活。事實上，他正做著軍事及一切其他方面的策略。<sup>10</sup>

其對政局仍有絕對的影響，原因除了蔣具國民黨總裁的身分之外，長期以來嫡系要員皆以蔣為馬首是瞻。

## 2. 幕後掌控政局

蔣在溪口這段期間是否幕後操控政局，大部分記者、李宗仁的重要成員、司徒雷登等人都認為蔣確實操控政局，但跟隨其身邊的曹聖芬則不認為如此，甚至認為是受到中共造謠的結果。但事實上最大的問題是蔣身為國民黨總裁，對於來訪者大部分都不吝指示。

蔣接見重要幹部時除話家常之外，大部分以商討重要方針及國事為主。1月22日，接見陳誠主席，商談今後臺灣軍政經濟方針。同日，蔣電青島劉安祺司令官：

中已於昨日離職，但一切軍政人事與業務決無變更，皆應照常進行，尤其在此人心動盪之際，各地負責主官更應以身作則，積極負責督導所部，振作精神，嚴整紀律不得稍有疏懈為共所乘。<sup>11</sup>

1月26日，接見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保安局局長毛人鳳，研討營救北平國軍的方針。27日，與行政院政務委員陳立夫共同進餐，餐後商談黨務，並檢討以往對共黨的策略，而且認為過去對中共太過寬大，而美國馬歇爾特使與華萊士副總統等皆受俄共的蠱惑，遺害於中國，尚不自知。接見林崇鏞局長商談中央銀行現金運送廈門辦法。1月31日，接見中國國

<sup>10</sup> 司徒雷登、李宜培等譯：《司徒雷登回憶錄》（臺北：中央日報社，民國44年1月），頁141。

<sup>11</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2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民黨祕書長鄭彥棻，商談中央黨部決定先行遷往廣州，應就現況加以整頓，再圖根本改革，而且認為本黨非澈底改造不能復興革命。接見重慶綏靖公署主任張羣，愷切說明今後對內對外之方針，並告知其內心的願望，希其轉達各方同志，其意：

1.此次引退，認為心安理得，無論黨國與個人實為轉危為安惟一之關鍵，得此良果實出於理想之上。2.自此以後願終身為黨服務，領導革命而不再當政，是為惟一報國自全之道，否則亦須在野五年從事基本工作，以建立獨立自強基礎，而不再受外力所壓制，非有此把握，決不再出而當政。<sup>12</sup>

蔣三次下野都提到失敗的反省，第一次下野1927年8月28日，蔣自離職回來，無日不自思此次失敗原因：「此次失敗之原因有三：第一原因，軍政時期兼行訓政、憲政；第二原因攻魯策略不定；第三原因，其病在對人，忽略對事。」第二次下野時於1931年12月24日談到：「談及此次革命失敗之由，皆余一人之過。」<sup>13</sup>第三次下野，1949年1月22日提到：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是無異失去其靈魂，焉得不為失敗。<sup>14</sup>

2月15日，接見毛人鳳，談到時局：「（1）對李宗仁等希望其不投降中共，不參加聯合政府，不違反黨紀則應始終予以支援。（2）對中共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為惟一要務。」<sup>15</sup>2月17日，接見閻錫山，商談黨政軍各項問題，閻認為當前最迫切的是：「整飭紀綱，實行檢查，惟效用人，惟效繩人，以提高行政效率。」蔣表同意，同時主張：立法院地點仍設廣州，行政院重要部會主官應駐在南京，但其機構仍在廣

<sup>12</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3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13</sup> 《事略稿本》（十二）（臺北：國史館，2004年），頁482。（《蔣中正總統檔案》）

<sup>14</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2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15</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1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州。後來李宗仁有意調換孫科院長，蔣主張由李宗仁自行決定行政院長人選，使彼能完全肩負責任。<sup>16</sup>蔣並告訴閻：一切關鍵乃在和與戰政策的決定，否則整頓綱紀，振作人心，皆無從談起，而李宗仁致毛澤東函，承認毛所提「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是等於無條件投降，更何能整頓紀綱，振作人心。<sup>17</sup>

李宗仁對蔣有如芒刺在背的感覺，以退為進。4月18日，李宗仁要求蔣回京復職，而彼下野，如要與中共應戰，必須由蔣賦予全權。蔣則認為如欲此最好建立制度，也是後來杭州會議召開的重要原因。蔣要求朱家驊、吳鐵城轉示其大意：

我個人今日已無權可授，如必欲我對軍政幹部用書面示意服從代總統命令不得違背，則不如由黨決議授權為正式，但如此必須其尊重黨紀，恢復黨與政之正常關係，今後凡政策與人事必須由政府提經中央政治委員會通過，並由代總統對黨提一書面聲明，以代誓詞。<sup>18</sup>

李又要求蔣下令將運往臺灣的黃金、武器運回，甚至要求蔣出國，也是為了斷絕或降低蔣的影響，使其能成為「真正」的總統。

蔣除對來謁的黨政軍要員面授機宜外，也常自我籌謀國事。回到溪口的第一天，就開始研討國民黨的改造方案，1月25日，朝課後研究北平國軍如何空運與撤退的策略。31日，研究一般情勢與對內對外的政策，對內要求黨政幹部擁護李宗仁，開誠佈公表示至少在五年內決不出而主政，但不要再對中共和平抱持任何幻想，而且李也須對黨尊重黨紀，重要政策必須提黨通過後方得實施。對外政策方面表達願以在野革命領袖地位協助政府主政。<sup>19</sup>

<sup>16</sup>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第2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頁572。

<sup>17</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17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18</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4月1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19</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19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2月1日，蔣研究中共與李等和談的陰謀認為：（1）俄共為防制余再起，故不得不利用李作傀儡，建立所謂聯合政府。（2）俄共為防制美國援華，更欲利用李以阻礙美援。（3）李等為防制余再起，極欲向中共求和，因彼等要剷除國民黨基本力量與革命歷史及領導權。中共與李等的目的完全一致，但李等力量單薄，中共不能不利用李等以制本黨，又不能不防李等為其後患。<sup>20</sup>

2月3日，研究今後出處之要旨，曰：此次引退切莫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應作五年基本工作的打算，這些工作包括：（1）外交無確實把握不宜主政。（2）世界局勢無急劇變化亦決不從政。（3）國家未至最危急地步或萬不得已時決不從政。（4）如能終身不必從政而以在野之革命領袖身分領導人民與政治黨務以從事於革命基本工作，為民生與社會之改造而努力，此乃畢生之願。其後並研究中共今後之行動、對美外交、教育及國軍作戰計畫等。

### 3. 鄉情與遊歷

蔣下野後與家人共享山林之樂，1月22日，蔣回到老家，聞訊而來的鄉親甚多，隨即拜謁王太夫人采玉墓，王太夫人的墓在半山腰，蔣坐軟轎至山腳即步行前往，以示對王太夫人的孝意，隨即寓居慈庵，也是對王太夫人的感懷。蔣的孝思毋庸置疑，蔣經國在《我的父親》中提到：「父親一生，事親以孝，報國以忠。」<sup>21</sup>或許蔣的威權統治為許多史家或不認同其統治風格者所批評，但對於蔣的孝思，批評者甚少，自父親去世後，感念母親的付出，對其意見相當尊重，<sup>22</sup>不論第一次下野或第三次下野，除

<sup>20</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21</sup> 蔣經國：《我的父親》（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7年），頁219。

<sup>22</sup> 1920年1月下旬，王太夫人生病到上海，蔣親自侍藥，一個多月，直至病癒才回奉化。1921年6月14日，王太夫人病逝，蔣親自撰文告哀，每思及其母的告誡，更加精進，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民國67年10月，頁37。

到其母墓拜祭外，蔣與母舊遊之處，如雪竇寺、千丈巖等都是蔣常出遊的重點。

1月23日，適逢農曆年前夕，觀家人做年糕，頗以為樂，蔣經國感慨說：「蓋父親一生最喜過平淡的生活」。<sup>23</sup>24日，孫蔣孝文等來庵晉謁，蔣在院中觀其遊戲，頗得含飴之樂，這段期間最常陪蔣介石者，除蔣經國外就是蔣孝文。26日，於報本堂（族廟）款宴族親友及故鄉父老百餘人，蔣氏族人對蔣的發展，亦頗有榮焉，蔣感慨地說：「故鄉風味之娛人，為任何事物所不及，實為人生至樂。」

1月28日，農曆除夕晚與家人在報本堂圍聚，自1913年後，蔣第一次與家人在家鄉共度歲，當天與蔣共度者還有張羣、陳立夫、鄭彥棻，蔣感慨說：「憂患相從，甚難得也。」<sup>24</sup>29日，蔣經國與家人來拜年，陳、張、鄭等人亦來賀年，蔣率家人祭祖。2月5日，與蔣經國、蔣孝文遊育王寺，同行者尚有陳立夫張道藩、谷正綱、陶希聖、石覺、李文、袁樸等。回家途中民衆夾道歡迎，加以過年氣氛相當熱鬧，蔣感嘆的說：「鄉人熱情如此，未知將何以為報。」

雖然蔣在溪口的時間不長，但這段期間的確是蔣難得與鄉親在一起的時間，而且與蔣宋美齡電文往來特別頻繁。1月21日，宋美齡在紐約電蔣：

報載兄已於馬日返鄉小住，對兄之健康與安全，妹萬分憂念，深信上帝決不會任其共產主義在中國能夠成功，請勿忘兄之安全為第一，則余等仍可繼續為國家努力奮鬥。此間並非無希望，且與多方人士已有聯絡，正極力推動中，妹已另電經國，請兄日內同來加拿大，妹當在家候兄會商一切。盼復。<sup>25</sup>

<sup>23</sup>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第2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0年），頁559。

<sup>24</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29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25</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蔣總統引退與後方佈置（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蔣覆電曰：「兄已安抵家鄉，諸事布置完妥，一切順利，心地安樂，如息重負，甚感上帝保佑能得此良果，實出預期之上也。」2月16日，宋美齡來電：

妹在此已停止工作，但與各方聯繫，不能遽爾中斷，一般對我友善者，謂妹一離開此，則勢必前功盡棄，未免可惜，為國為黨，只得俟此間能告一段落，即謀歸計。<sup>26</sup>

蔣覆電：「務望從速歸來，勿再留美，以完成兄之志願。」宋美齡再電：「短期內尚不能回國」，可知蔣宋函電頻繁。

蔣自擔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直忙於國事，三次下野都有遊歷，第二次由於與宋美齡同行，加上當時蔣身體不適，因此遊歷地方最少，第三次最多，除舊遊溪口附近的名山之外，寧波地區亦是其遊歷的重點，如天一閣、育王廟、天童寺、金紫廟等都曾經駐足，而最常去省思的地方則是慈庵及古寺。最常陪侍的是蔣經國，此外常帶其孫蔣孝文出遊，第三次下野自覺「心地安閒，如釋重負」，得以好好觀賞故鄉的好山好水。回故鄉後的下午，即由蔣經國陪同出遊慈庵附近的山上，蔣謂：「在故鄉遊覽山水為平生最樂之事，尤其在戰塵瀰漫中引退之時，更覺難得，而其樂亦無窮。」<sup>27</sup>1月23日，與蔣經國遊藏山、白巖，順道探訪徐氏舅父住宅，蔣感慨：「昔日房舍與人物，今皆不能記憶，不勝滄桑之感也。」其後相繼遊溪口武嶺學校、藏山、涵齋等處。

2月1日，與蔣經國、陳立夫遊雪竇寺，在方丈第進素餐，由於蔣母王太夫人篤信佛教，蔣雖已信基督教，但對於佛教寺廟亦不排斥，因此常遊寺廟，2日，與蔣經國遊鄉村，感慨地說：

當政二十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毫未著手，此乃黨政軍教育人員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

<sup>26</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26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27</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2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尚未為晚。<sup>28</sup>

7日，與蔣經國、蔣孝文、陳立夫遊石倉，8日，與蔣經國、蔣孝文、蔣孝章遊法華庵竹山，14日，與蔣經國、蔣孝文遊下坪，記曰：「今日方悟人生之樂有如此也。」19日，與蔣孝文等遊隱潭廟，20日，與蔣孝文等遊覽雪竇寺。過去蔣由於戰事困擾，無法安心內眠，下野後居然可以睡足六個半小時，蔣也認為是：「近年來少有之佳象。」蔣遊山時有時由隨從抬轎，有時步行。

#### 4. 修譜及閱讀

中國傳統社會，重視族譜，各姓各族大抵三十年重修一次，清朝時期，溪口蔣氏共修過八次族譜，分別是1699年（清康熙38年）、1716年（康熙55年）、1737年（清乾隆2年）、1768年（乾隆33年）、1799年（嘉慶四年）、1828年（道光8年）、1858年（咸豐8年）、1888年（光緒14年），清朝最後一次修譜蔣介石才兩歲。<sup>29</sup>當時的族譜世系表已將蔣介石列上，肇聰下有周康（字介卿）、周泰（即蔣介石），民國時期，蔣氏二次修族譜，第一次是在1918年（民國7年），第二次是在1948年（民國37年）修《武嶺蔣氏宗譜》，但因宗譜過於繁亂，蔣在引退溪口期間，幾次宴請族中長輩，長輩希望其能找人彙整，因此引退後修譜成為蔣的重要工作。

蔣在繁忙之餘，閱讀宗譜所載王太夫人傳，及宗譜的內容，在《事略稿本》中，即提到蔣分別於2月3日、2月26日、3月9日、3月11日、3月14日等日閱讀有關宗譜的資料，<sup>30</sup>認為應該分成兩方面，一是修直系家譜

<sup>28</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29</sup> 王舜祁：《青少年時期的蔣介石》，《奉化文史資料》，第13輯（浙江：奉化市政協文史委員會，2002年），頁11。

<sup>30</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2月23日、26日，3月9日、31日等。（《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小族譜），一是仍然重整整個族譜，蔣爲此事三個多月期間至少六次接見祕書沙孟海及相關人員（如蔣國彥等），討論修直系家譜之事。

蔣責成沙孟海組成修譜小組，進行訪查與修訂，特別是直系的家族，3月22日與沙孟海討論編小宗譜格式，終於完成蔣氏家譜的修訂工作。

蔣引退後幾乎都有做早課及撰寫日記的習慣，閱讀方面除聖經外，以曾國藩、王陽明的著作爲主，由於修家譜之故，此時期閱讀許多家譜的資料，甚至閱讀奉化地方誌。

### 三、選擇來臺的原因

引退後，除出遊寧波外，極少離開溪口，4月22日，杭州會談是其參加第一次的公開活動，23日，國軍撤離南京，局勢日趨嚴重，24日，蔣囑蔣經國準備船，蔣經國及其幕僚都不知蔣要去那裏，本來猜是去基隆或廈門，結果登艦（太康艦）後，蔣才說去上海，此時中共已渡江，上海岌岌可危，抵上海後再前往定海、馬公，最後轉往臺灣（來臺路線圖如附件二）。其中有兩個問題，其一，蔣對於政府遷臺的安排？其二，蔣個人何時決定來臺及其原因爲何？

臺灣是蔣下野後安排退路的選項之一，但不是惟一的選項，南京是國府成立的首都，抗戰期間首都暫遷重慶，抗戰結束後，還都南京，國共戰事緊急之際，曾有人再提遷都之事，蔣都不予回應，1948年11月19日，約見邵力子等中常委，談及政府遷徙之事，有以此舉將使人心渙散不啻分崩離析，其將何以再樹重心。蔣表示：

所謂重心也者，不在乎首都之在何地，而凡於我一人之所在也，如我在世一日，即反共一日，以底於成而後已，故我在何地即其重心所在，不必以遷都與否爲慮，更不必以南京之得失爲意也，若懷遷都即崩潰之心理，而不能排除之，此適中共之陰謀毒



計。<sup>31</sup>

1月17日，寫信給其妻宋美齡時再度表示：「政府決不遷臺，兄亦不即刻赴臺。」<sup>32</sup>2月1日，蔣記曰：

近日為蚌埠吃緊，關於遷都與政府裁員問題，謠誣紛紜，人心動盪，致公務員與社會皆呈紊亂不安之狀，乃由行政院院會決議，表明決不遷都以闢謠言。<sup>33</sup>

由此可知，蔣在引退之前對固守南京之決心，並作若干的軍事部署，先守長江，長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被占，將重心移東南的廣州、西南重慶及臺灣。

特別是上海，蔣希望集中兵力全力守衛上海，以待國際變化。蔣召見顧祝同參謀總長、徐永昌國防部長、湯恩伯（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等研討長江北岸之軍事部署，蔣以為各主管僅有命令與紙上計畫，而毫無準備與實施監督行動，尤其對於材料與經費，不分輕重緩急，延宕不發，為之痛恨，分別予以斥責。<sup>34</sup>湯恩伯乃進一步提出江防的腹案：以江防線阻止共軍，並以上海為決戰及掩護軍隊物資轉移要區，依徽州附近部隊之策應，向浙贛線轉移。當時蔡文治反對湯之方案，兩人發生爭論，湯恩伯強調：蕪湖以西及江陽、鎮江均係共軍主力渡江地區，國軍即使集中兵力亦無法有效阻止共軍南渡，一旦江防被破，皖南交通不便，大軍轉移困難，國軍主力應配置於南京以東及以南地區。<sup>35</sup>蔣同意湯的意見，認為固守上海甚佳，但皖南防禦薄弱，應在戰術上及方略上圖謀補救。<sup>36</sup>在接見湯恩伯、陳大慶（上海警備司令）、石覺（上海防守司令）、毛瀛初（上海區

<sup>31</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2月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32</sup> 《蔣總統家書—蔣致夫人書信》，第3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33</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2月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34</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1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35</sup> 張秉均：《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戡亂戰役述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7年），頁82。

<sup>36</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3月1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空軍司令)時,特別要求堅守上海。4月9日,見張羣與其談話重點:談到:「作戰方針,保衛政治中樞,應在京滬地區實行決戰,因長江全線則處處薄弱,以現在士氣與兵力決不可能,如移京滬地區我軍主力於皖南守江,則京滬必先陷,而皖南我軍主力亦必無形消滅與崩潰。」<sup>37</sup>在其離開漢口抵上海後,蔣經國回憶當時情形:

父親終於從復興島遷到金神父路勵志社去住,在那兒,父親整天忙著處理有關保衛上海的許多問題,同時,每天都要召集地方人士會商,或召集在上海的黃埔學生訓話,每次講話的時候,總是很懇切而坦白的告訴他們說:「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應付危難。」<sup>38</sup>

即使來到臺灣也關心「上海作戰計畫與兵力部署」,要湯恩伯加強上海的防衛,著手修築碉堡等防禦工事,指示蔣經國赴上海面告湯恩伯總司令,關於上海之作戰要旨,應縮短原定戰線再圖安全撤退。如能固守仍應不撤,並告以撤退武器與物資之注意事項,<sup>39</sup>由此可見蔣在戰略上甚為重視上海的防衛。

此外,重慶與廣州也是蔣佈防的重點,蔣在引退前任命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以重慶為基地。陶希聖在接受訪問時提到:

在總統引退之前,總統發表幾道人事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陳誠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又以張羣出任重慶綏靖公署主任。<sup>40</sup>

1月17日,蔣約見張羣,特別要其穩固川滇政局。並指示各地負責主官應以身作則,積極負責督導所部,振作精神,嚴整紀律不得稍有疏懈。<sup>41</sup>4月24日,陳誠擬「我軍今後作戰計畫」:國軍以持久作戰之目的,確保廣州與重慶兩大陪都,首先沿浙贛路與湘桂路及其以南地區準備第二抵抗

<sup>37</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4月9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38</sup> 蔣經國：《我的父親》（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7年），頁64。

<sup>39</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5月2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40</sup> 陳存恭：《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3年），頁251。

<sup>41</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22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地帶。<sup>42</sup>蔣曾向白崇禧提出他的防守西南計畫，以從陝西後撤的胡宗南部保衛川北，以宋希濂部屏障川東，華中黃杰兵團增援貴州，使川黔與兩廣聯繫起來，張淦兵團、徐啟明兵團、魯道源兵團等兼顧湘南及粵北，駐海南島的劉安祺兵團可調兩個軍到廣州駐防。<sup>43</sup>蔣的佈防不是單線，而是幾個重點同時進行，蔣手定軍事部署如下：

擬以上海撤退之軍隊移駐舟山羣島，以福建潰散各部擇優先移臺灣廈門整訓，以青島撤退部隊進駐瓊州，先將此三羣島守備加強，尤應積極肅清瓊州土共而掌握之，然後再向沿海各地發展。<sup>44</sup>

但臺灣則是其最重要的一步棋，蔣到臺及決定以臺為反共基地，應不是倉促決定，推其因：

（一）對臺的印象不錯：1946年10月21日，蔣偕宋美齡遊臺灣，深覺：「臺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范省，則俄共雖狡計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sup>45</sup>並且提到：「巡視臺灣之收穫，較之巡視東北之收穫尤大，得知全國民心之所向。」<sup>46</sup>根據張其昀的回憶認為早在來臺後蔣就對記者稱：「只要有了臺灣，共產黨就無可奈何。」<sup>47</sup>京滬杭警備副司令兼戰地政務委員會秘書長祝紹周建議，由張發奎主持海南島軍事，臺灣、福建、浙江、廣東及海南島之間，以臺灣為中心，軍事上應有一堅強組織，萬一東南軍事受到挫折，以臺灣為基地，配合國際形勢演變，恢復國民黨的基業。<sup>48</sup>

<sup>42</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4月24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43</sup> 程思遠：《白崇禧傳》（香港：南粵出版社，1989年），頁308。

<sup>44</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5月26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45</sup> 《事略稿本》，民國36年10月26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46</sup> 秦孝儀：〈先總統蔣公與臺灣〉，《近代中國》，第31期（民國71年10月）。

<sup>47</sup> 張其昀：《張其昀先生文集》，第十三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民國78年），頁6,690。

<sup>48</sup> 胡春惠、林泉訪問：《祝紹周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1

(二) 陶希聖、張其昀、陳誠、蔣經國等的建議，特別是陳誠具關鍵的影響。當局勢危殆之際，左右有建議重視川防，但陶希聖則認為臺灣地位重要：「我想從臺灣復興這是將來的希望，因為英美是海權國家，一到臺灣以海洋為基地，可與太平洋對岸的美國打交道，這中間還大有可為。」<sup>49</sup>對於臺灣的地位，魏德邁與胡適有不同的意見，魏的意見：「依余之意見，臺灣為反共之基地，其政策必須為謀地方人民之福利為其目的，且具有高度之行政效率可作為政府之表率。臺灣有豐富之資源及動力以支持其政府，此當盡量開發並用以增進人民之福利。」胡適則與魏的看法不一，曾提到：「臺灣只有七百萬人口，臺灣的工業又不是可以獨立自給的經濟基礎，我們必須在大陸上撐住一個自由中國的規模，維持一個世界承認的正式政府。」<sup>50</sup>此外，蔣經國的建議應也是蔣決定來臺的原因之一，蔣經國長期陪侍蔣介石，對蔣之命絕對服從，但有時蔣也會垂詢其意見，蔣經國也會提出其見解。1948年6月26日，蔣經國電蔣：

我政府確已面臨空前之危機，且有崩潰之可能，除設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作後退之準備，兒決非因消極或悲觀而出此言，即所謂退者亦即以退為進之意也，有廣東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才有抗日之勝利，而今後萬一遭受失敗則非臺灣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無形中從速密籌有關南遷之計畫與準備。<sup>51</sup>

陳誠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之後，奉命到京，1月21日，陳誠的飛機抵定海上空，臨時接獲指示飛杭州，蔣下野回奉化途中接見陳誠、陳儀等人，短暫請示後，到南京謁李代總統宗仁及孫科院長述職，25日返臺，返臺後即在臺準備澎湖二處、臺北、陽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等八個地方，作為蔣選擇為臨時駐用之所。<sup>52</sup>這些處所正是蔣來臺的路

年)，頁53-54。

<sup>49</sup> 陳存恭：《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頁251。

<sup>50</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5月19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51</sup> 《蔣中正總統文物—領袖家書》，光碟第45卷。（《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52</sup>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臺北：國史館，民國94），頁19。（石叻叢

線及暫居之處，也可知道蔣來臺與陳誠的安排有密切的關係。3月24日、25日，陳誠再度至溪口報告臺灣的情形，並建議蔣駐臺灣，國共和談無結果後，中共渡江，4月29日，陳誠電蔣請其早日駐蹕臺灣：

和談決裂後，今後剿共戰事，勢必長期奮鬥到底，為號召國內外愛國志士，及聯合國際上反共勢力，鈞座為自由中國之旌旗，駐節所在地點，亟宜早日確定。關於馬公島情勢，職業已實施勘查，深覺該地交通通訊，頗為不便。職認為臺灣，既為吾人革命復興最後根據地，殊無其他顧慮之必要。擬懇早日駕臨臺北，長期駐蹕，則指揮各方，皆多便利。或於穗滬渝等處，設置行轅，必要時，巡行指揮。<sup>53</sup>

其後一再催蔣早日飛臺，5月11日，陳電蔣：「職意鈞座應即飛臺，又鈞座行動似不必祕密，以示自由。」5月15日再電：「讀李之談話，深感領袖受辱，幹部之恥也。彼輩只知利害與力量，決不能以理喻與情動。乞鈞座逕飛臺北，一切不必顧慮。」<sup>54</sup>5月17日，蔣即飛抵馬公，並沒有直飛臺北，但馬公也是陳誠準備的八個據點之一。陳誠接任後面對不斷移入的人口，其間夾雜著散兵游勇以及潛伏的中共分子，或將破壞臺灣的安定，必須積極有所作為，阻止可能由對岸進入臺灣的不利因素。先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公布「臺灣省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3月1日實施），同時公布「入臺軍公人員及旅客注意事項」，各項出入境管理措施紛紛出籠，如「戒嚴時期加強管制航運旅客入境及檢驗辦法」，<sup>55</sup>此辦法引起大陸籍民意代表的反彈，對此蔣並沒有表示意見，雖然蔣、陳之間或存在一些緊張關係，但正如薛化元教授曾針對陳誠主政臺灣的問題談到：

書)

<sup>53</sup>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994。（石叟叢書）

<sup>54</sup>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995。（石叟叢書）

<sup>55</sup>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省旅客入境出境辦法〉檔號：233/002-02。（國史館藏）



陳誠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期間雖不到一年，但是，無論是解決當時臺灣內部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或是消除臺灣內部可能挑戰（威脅）國府統治力量，都有相當的成效，對於政府遷臺以後統治體制的鞏固，以及其後臺灣發展的基調，都有相當關鍵的影響。<sup>56</sup>

陳誠此時建議蔣來臺，推斷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三）李宗仁的再三逼其出國：李宗仁對蔣介石在國內操控政局有如芒刺在背，早在上海和平代表團赴北平前，即請黃啟漢轉達意見，以蔣介石留在國內，有礙和談，促其出國。<sup>57</sup>8日，南京《救國報》（主筆龔德柏）以「蔣不出國則救國無望」等標題攻訐蔣；4月1日，和談代表張治中、劉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等飛抵北平，張治中在行前建議蔣出國，並分析其利弊。出國之利：1.可避免成為攻訐目標；2.卸去和戰失敗之責任；3.使一般將領減少依賴心理；4.可增長見聞；5.可轉移人民的觀感，恢復人民的懷念。出國之害：安全問題、軍事頓失中心、黨難免渙散。<sup>58</sup>在北平談判觸礁，張仍電請蔣「及時痛下決心，毅然放下一切暫時出國」。<sup>59</sup>面對此局勢，蔣的態度與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sup>60</sup>李宗仁則一再逼其表態。蔣經國曾記道：

38年4月間，父親在上海支撐危局，誰知李宗仁竟寫了一封信來，要求父親離開上海；父親離開上海的時候，並沒有說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艦到達舟山，也沒登岸，祇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

<sup>56</sup> 薛化元：〈陳誠與國民政府統治基盤的奠定——一九四九年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為中心探討〉，《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頁283。

<sup>57</sup> 黃啟漢：〈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1981年1月），頁15。

<sup>58</sup>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2月），頁802-03。

<sup>59</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4月1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60</sup>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12月），頁58。



去視察，前後在海上漂泊了十天，真是乾坤萬里，滄海茫茫，處著這樣逆境、絕境，無論誰都要心灰意冷，走投無路的，而父親卻泰然處之，在日記上寫到「只要前見，不變其方向，即使無路處，亦可新闢道路，達到目的」。

父親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信來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臺灣的庫存的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沉痛，是不難想像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覆信，大意是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不是軍閥，至於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sup>61</sup>

從這兩段中，可以看出李的要脅函的確有影響，因為蔣在寫信給李的第二天即離開上海，轉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島觀察，而後即經馬公到臺灣。環境的變化、時局的判斷、幕僚的建議，加上北平和談失敗之後李宗仁要脅的信函，應是蔣來臺的原因。

#### 四、來臺的籌謀

至於來臺前的準備，最重要的是人事安排方面，蔣意識到局勢的詭譎多變，人事佈局方面，陳誠是蔣的重要棋子。在蔣的主導下，行政院第32次政務會議於1948年12月29日召開，通過陳誠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12月3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蔣經國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董顯光認為：

他（蔣）已決意使臺灣得免受共黨陰謀的威脅，俾中國大陸

<sup>61</sup> 蔣經國：《我的父親》，頁41、64。

萬一發生意外，該省可為政府最後堅守力圖復興之地。<sup>62</sup>

對於接掌臺灣省政，刻在臺養病的陳誠，突然接獲受命為臺灣省政府主席，連自己都深感錯愕與意外，與魏道明商議後，覆電蔣，認為魏表現不錯，應該繼續擔任省主席，其個人願意在軍事上協助，但蔣不讓其多所考慮，1949年1月2日、3日，分別電陳要求其迅速就職，不要延滯，以免夜長夢多。<sup>63</sup>陳雖然「自度極不適宜，惟國家安危所繫，不能不悉力以赴」，與魏道明商議後，決定於1月5日就職。但也要求中央明確任命，陳電蔣的函電中談到：「惟職除接鈞座亥儉斗手啟電囑速行準備，及閱報知已發表職主臺外，並未接到中央隻字，於法無據。請鈞座轉飭主管單位，先來一電，以資根據為妥」。<sup>64</sup>行政院隨即發表陳的人事任命案，陳在就職的記者招待會中強調：「將使臺灣成為一個復興中華民族的堡壘，來擔負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

陳誠在就任二天後，即向蔣報告臺灣省交通的情形及請示如何處理，大約分為六項，節要如下：

其一，臺灣近因中央軍政機關遷臺單位激增，美援物資到達，而上海商人及貨物，更紛湧沓來，以致基隆、高雄兩港，均行擁塞，就中基隆港情勢，尤較嚴重。該港原有碼頭十八座，現在港船隻四十一艘，內商船二十四艘、軍用十七艘，因無統一管理機構，卸載困難萬分，各船有候卸一個月以上者，甚至原船開回上海者，如不早為設法，則美援物資之接轉、軍公商物資之進出口，今後必更困難。其二，擬請飭中央軍政各機關，凡不必要之單位及物資，不必遷臺，以免過度擁擠，並招人民不良之觀感。其三，高雄港亟待疏濬，經向海關洽妥，即派挖泥船一艘來臺，費用須臺幣24億（金圓券1,300餘萬元）職已權准暫墊。其

<sup>62</sup> 董顯光：《蔣總統傳》（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41年），頁510。

<sup>63</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2日、3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64</sup>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987。（石叻叢書）

四，基隆、高雄兩港，起重設備均不敷用，擬請飭財政部轉令海關，速將津、青、滬起重機，抽調來臺。再入口物資激增，現在碼頭及在船中之貨已達十二萬噸，鐵路每日運量三千噸，現正設法加至四千噸，擬請令飭善和救濟總署，速調二十噸拖平車一百部，連同車頭來臺，以應急需。其五，全臺因軍公商物資激增，亟需修復倉庫，而五金材料之採購，尤屬迫不及待，擬請令飭審計部簡化手續，予以便利。其六，中央遷臺各單位，軍事方面：海陸空勤各部，行政方面：交通部、資源委員會、財政部、審計部，擬請分別指派負責人員。尤請指派統一軍政負責人員，以資協調。又此間交通方面，須有幹員主持，擬請轉飭俞部長大維，派石志仁同志即日來臺襄助。<sup>65</sup>

陳誠這份報告是有所本，進入1949年之後上海與基隆間的往來更加頻繁，特別是基隆港業務量大增（如下表）。

戰後基隆港進出港口船舶統計表：

年別	進港		出港	
	艘次	總噸位	艘次	總噸位
1947年	1,159	1,767,073	1,147	1,769,658
1948年	1,371	2,532,060	1,351	2,465,445
1949年	2,108	3,853,221	1,991	3,817,171
1950年	1,222	3,088,635	1,322	3,114,943
1951年	929	2,869,341	914	2,831,907

資料來源：《基隆港建港百年紀念文集》（基隆：基隆港務局，民國74年），頁129。

陳也深怕過多的逃難潮，使臺灣無法掌控，因此才對蔣提出上述的建議，但蔣此時只想穩定臺灣局勢，對陳誠的就任除深感欣慰外，並付予陳更多的權力，決定駐臺陸海空軍及機關皆歸陳誠統一指揮。<sup>66</sup>電陳誠談

<sup>65</sup>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下），頁987-88。（石叟叢書）

<sup>66</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7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到革命環境險惡，今後應注意：

- 1.駐臺空軍及其眷屬應特別協助安置，如有必要，經費可先津補，准予報銷。
- 2.不可多發表意見，免人誤會。
- 3.可否約張發奎來臺商談時局與利害，使其不為反動派利用。
- 4.廣州綏靖主任擬派余漢謀繼任，而伯陵（薛岳）任陸軍總司令，可電伯陵來臺面商，不必明言其任務何如。<sup>67</sup>

1月8日，陳誠回電報告遵辦情形。1月10日，再電蔣談對政局的處理及政府機關遷臺的意見，其重點如下：（一）臺灣受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地方對中央多疑懼，希望中央來臺人士必需注意，以免二二八事件重演。

（二）對於中央軍政機關遷移，應妥擬整個計畫，分別指定指揮人員，以免各自為政，而亂步伐。（三）應注意民生問題，資委會在臺，宜專辦國防工業為主，輕工業及民生工業，似宜即交地方經營，或民營為妥。中央遷臺部隊機關工廠等人員，及自行逃難來臺者，截至去年底（1948），共達二十萬人，後至者且踵相接，預計可能超過五十萬人，即以目前情形論，如經濟財政不能配合，全賴發行臺幣維持，則臺幣現已呈慢性膨脹，三、五個月後，勢必演至惡性膨脹，至無法收拾。<sup>68</sup>

蔣又致電陳誠告知治臺方針：

- 1.多方利用臺籍學識較優，資望素孚之人士，參加政府工作。
- 2.特別培植臺灣有為之青年與組訓。
- 3.收攬人心，安定地方。
- 4.處事穩重，對下和藹，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訂計畫，總以腳踏實地、實心實力實地做事，而不發議論。
- 5.每日特別注意各種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與檢點用人標準，不可專憑熱情與個人主觀。
- 6.勤求己過，用人自輔，此為補救吾人過去躁急驕矜，以致今日失敗之大過，望共勉之。<sup>69</sup>

<sup>67</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6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陳誠往來函電接獲時間為1月7日。

<sup>68</sup>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頁990-91。（石叻叢書）

<sup>69</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1月11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雖然有許多輿論對陳誠有負面的意見，如李宗璜致蔣電（2月8日）：

上海方面輿論如下：1.黨團磨擦失盡黨心。幣制改革失盡民心，編遣軍隊失盡軍心。2.陳立夫誤黨（朱家驊應分謗），吳鐵城政學議誤政，陳誠誤軍，孔宋誤蔣，蔣誤天下（應由全體黨員分謗）。<sup>70</sup>

但這並沒有影響此期的蔣陳關係，而陳誠依然不時將治臺的情形向蔣會報。

除人事安排外，修建定海機場是其預留往臺灣的重要安排，對此蔣經國談到：

記得父親引退之後，交我辦理的第一件事，是希望空軍總部，迅速把定海的飛機場建築起來，那時，我不太明白父親的用意，祇能遵照命令去做，父親對這件事顯得非常關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問問，機場的工程已完成到何種程度，後來催得更緊，幾乎三天一催，兩天一催，直到機場全部竣工為止。到淞、滬棄守，纔知到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就是靠了由定海基地起飛的空軍掩護，才能安全的經過舟山撤退到臺灣，而成爲現在保衛臺灣和將來反攻大陸的一支重要兵力，如果不是父親的高瞻遠矚，湯將軍的部隊恐怕連舟山也無法達到，還會到臺灣嗎？<sup>71</sup>

安排黃金、故宮文物來臺及鞏固臺灣安全，亦是其籌謀作爲反共基地的一部分。（以後將專文討論，本文不加敘述）從蔣下野前的部署來觀察，臺灣只是其全盤計畫的重點之一，並沒有即刻遷移臺灣的計畫，下野前致宋美齡夫人信中提到：「政府決不遷臺，兄亦不即刻赴臺。」1月21日見陳誠之後，陳誠回臺後開始安排蔣臨時來臺的居所，3月18日，蔣考慮中央政府遷往臺灣的手續。<sup>72</sup>4月下旬，國共北平和談失敗，李不斷透

<sup>70</sup> 《特交檔案》〈中央報告〉。（《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sup>71</sup> 蔣經國：《我的父親》，頁41、64。

<sup>72</sup> 《事略稿本》，民國38年3月18日。（《蔣中正總統檔案》，國史館藏）



過關係逼蔣釋權、出國，蔣反而思考將府院權利的決策正式轉向由黨政運作，在中共渡江之後上海已甚危急，奉化當然不是久留之地，李要其出國、不要管事，蔣趁此到臺灣，李不能再規避責任。由此可知，蔣來臺既不是下野前就已決定，也不是倉促決定，而是隨時勢的遷移而作重要的選擇。

## 五、結論

民國以來蔣三次下野與復出，決不是孤立的個人事件，它反映了國民黨內部複雜的人際關係。蔣每次都是被迫出於無奈的下野，但他總以自動引退的姿態出現，儘量變被動爲主動，以退爲進，最後總能在時局的發展下，再度復出。但因時間與環境不同，尤以第三次下野局勢對蔣及國民黨最爲不利，然此次下野後的表現卻最爲成熟。

由於蔣雖引退總統之職，仍具國民黨總裁之職，李宗仁又不爲全國將領所接受，特別是長期以來跟隨蔣的「嫡系」部隊，仍以蔣爲馬首是瞻，加以在蔣引退前已作了若干的部署，如黃金及故宮文物等移置臺灣，因此李雖代行總統，卻無法控制政府，也無法指揮軍隊。可見重要的關鍵不在於職位，而在於人，雖然戰後國民黨黨外有黨，黨內有派，蔣領袖地位已受嚴重的挑戰，但蔣是中央的代表則無庸置疑。蔣任國民政府主席時，國民政府即是權力中心，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委員長即可控制全局，蔣任總統，總統是權力核心，蔣任國民黨總裁，決策即以黨爲中心。

第三次引退後，無形中溪口成爲指揮中心。每天都有訪客，訪客包括黨政軍要員，以蔣的親信部屬如湯恩伯、吳忠信、張羣等較多，西南軍系等甚少到此請益。從蔣的立場而言，身爲黨的領袖，有軍政官員以黨員的身分請益，蔣自應加以協助，但站在李宗仁的角度，自認爲蔣越俎代庖，干預國政。或有人認爲時局的變化與蔣李的鬥爭有關，其實主要原因不是誰掌實權，而是雙方的判斷都有問題，李的問題在於將冀望放在國



共的北平談判上，並沒有認清中共只是以談判作為籌碼，製造國內外和平的假象，當正式上談判桌，李才恍然大悟中共和平的陰謀。而蔣的問題則太依賴美國，認為只要情勢能控制保存南北的僵局，美國一定會支持國民黨，局勢將會改觀，但事與願違，判斷錯誤，一個逃美，一個轉進臺灣。

蔣在溪口期間，除政務的處理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其生活，蔣的心境更加成熟，雖然多少有些惆悵，但把握與親人相處的時間，此時的蔣與鄉親的關係亦更為融洽。第一次與第三次下野，有許多的場景相同，但心境不同，或許與年齡及歷練有關，因此在關心政治的同時，也關注一般的生活。

蔣引退後幾乎都有做早課及撰寫日記的習慣，平常除遊歷外，還研究國事及閱讀的習慣，最常閱讀的書以聖經、曾國藩、王陽明等的著作及許多族譜的資料，最後完成族譜的修訂工作，也算是這段期間對族系的貢獻。

至於個人來臺及政府遷臺，則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選擇，其決定雖非倉促，但也非引退前即已預定。在下野之前，臺灣只是其選項，不是唯一的選項，蔣本以為第三次的引退與前兩次一樣，很快又會再起，沒想到時局漸不利於國民黨，一方面蔣對臺灣的印象甚佳，加上西南派系複雜，對中央有異心，蔣的幕僚及當時在臺灣的陳誠建議蔣來臺，而李宗仁對於蔣仍在國內如芒刺在背，希望其出國，蔣利用杭州會議決議，將權利重心轉由黨來運作，如此李更不可為，一再進逼，蔣乃毅然決定來臺。雖如此，個人認為與其說蔣來臺是局勢所逼，倒不如說是蔣在1949年所作的最重要的選擇。至於來臺的準備，在其下野之前早作安排，陳誠的任命、蔣經國為臺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定海機場的修建與黃金、故宮文物運臺都是其籌謀的一部分，蔣來臺後幾次赴大陸企圖力挽狂瀾（如附件三），並企圖結合菲律賓與韓國，形成強有力的反共聯盟，但都無結果，臺灣成為其晚年的棲身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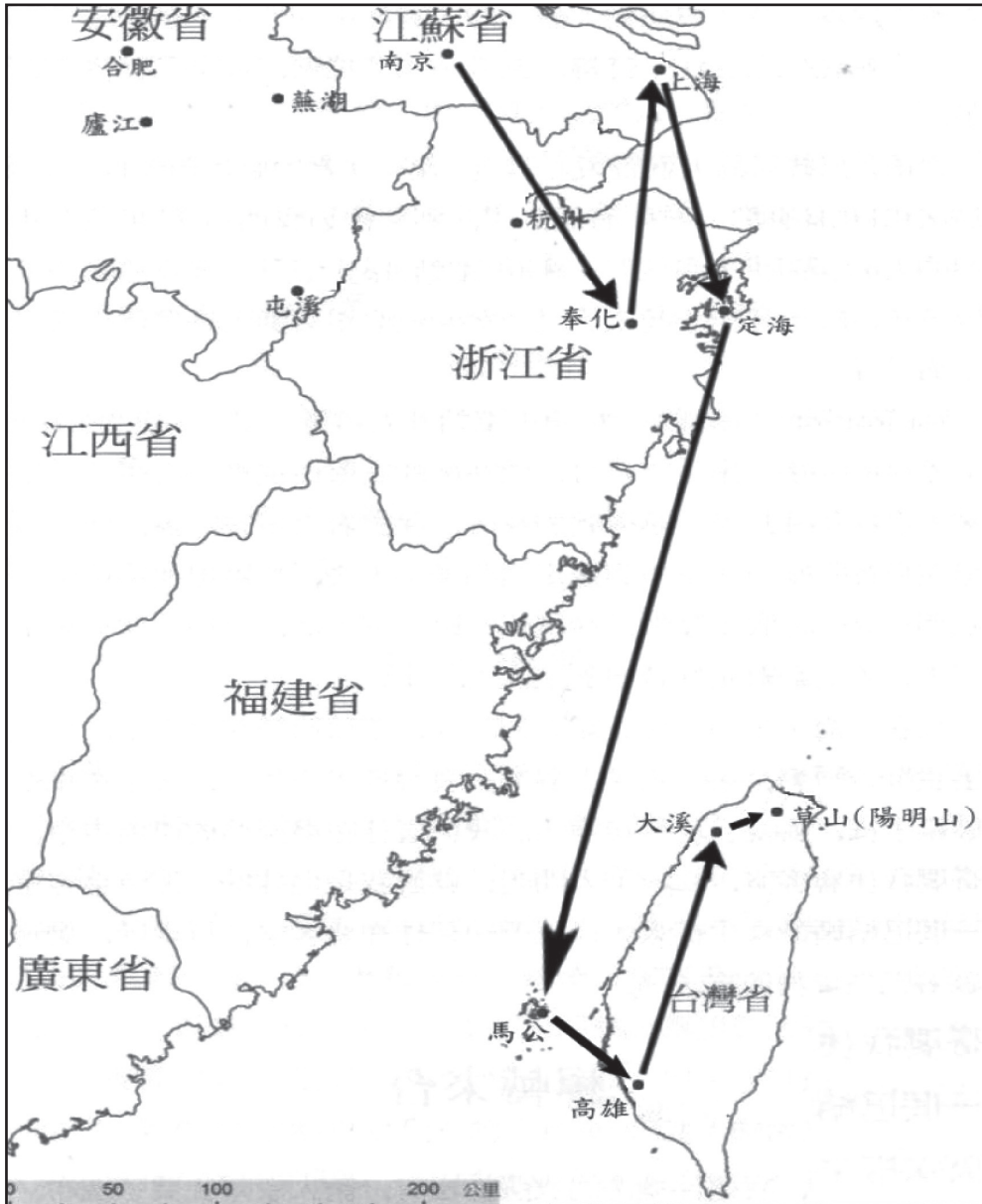
## 附件一：蔣引退後接見對象一覽表（1949.1.22-4.24）：

時間	接見對象	時間	接見對象
1月22日	陳誠（臺灣省主席）	1月24日	王叔銘（空軍副總司令）、劉安祺（第十一綏靖區司令）、余程萬（陸軍26軍軍長）
1月26日	王叔銘、毛人鳳（保安局長）	1月27日	林崇鏞（商標局局長）、陳立夫
1月28日	張嫺、郭懺（空軍總司令）、侯騰（廳長）、陳立夫（行政院政務委員）、鄭彥棻	1月29日	張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陳立夫、鄭彥棻（國民黨祕書長）
1月30日	黃少谷	1月31日	林蔚（國防部副參謀長）、鄭彥棻、毛人鳳、朱世明（駐美使節團團長）、黃少谷、陳儀（浙江省主席）
1月30日	黃少谷	1月31日	林蔚、鄭彥棻、毛人鳳、朱世明、黃少谷、陳儀
2月1日	陳立夫	2月4日	谷正綱（社會部長）、彭昭賢、陶希聖、徐堪（財政部部長）、毛人鳳、李文、石覺、袁樸
2月6日	石覺（京滬杭警備司令部副司令）、李文（華北剿總副總司令）、袁樸（陸軍16軍軍長）、彭昭賢、谷正綱、張道藩	2月7日	李彌（陸軍司令）、王叔銘（空軍副司令）
2月8日	朱國材	2月9日	陳立夫
2月10日	周宏濤（國民黨祕書）	2月11日	俞飛鵬（董事長）、李英奇（中國劇團副團長）
2月12日	黃仁霖（聯勤總司令部副總司令）、毛人鳳、徐學禹（招商局局長）	2月15日	毛人鳳
2月16日	閻錫山（綏靖公署主任）	2月17日	閻錫山、張道藩、谷正綱
2月18日	翁文灝、何應欽	2月19日	劉斐
2月20日	劉安祺（陸軍司令官）	2月21日	沈百先、毛景彪
2月24日	段灃（陸軍87軍軍長）	2月25日	王政
2月28日	方天（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江西綏靖公署主任）、王叔銘	3月1日	王叔銘
3月2日	張治中、鄞縣、鎮海、餘姚、奉化各縣縣長	3月3日	吳忠信、李惟果、張治中
3月4日	吳忠信、李惟果、宣鐵吾（京滬杭警備總司令部副司令）	3月5日	吳忠信、高吉人（陸軍第5軍軍長）
3月6日	吳忠信、徐佛觀、沈宗濂、王叔銘、魏濟民	3月7日	王叔銘
3月8日	李良榮、王新衡、毛瀛初、吳忠信、袁守謙、高吉人	3月9日	袁守謙（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兼祕書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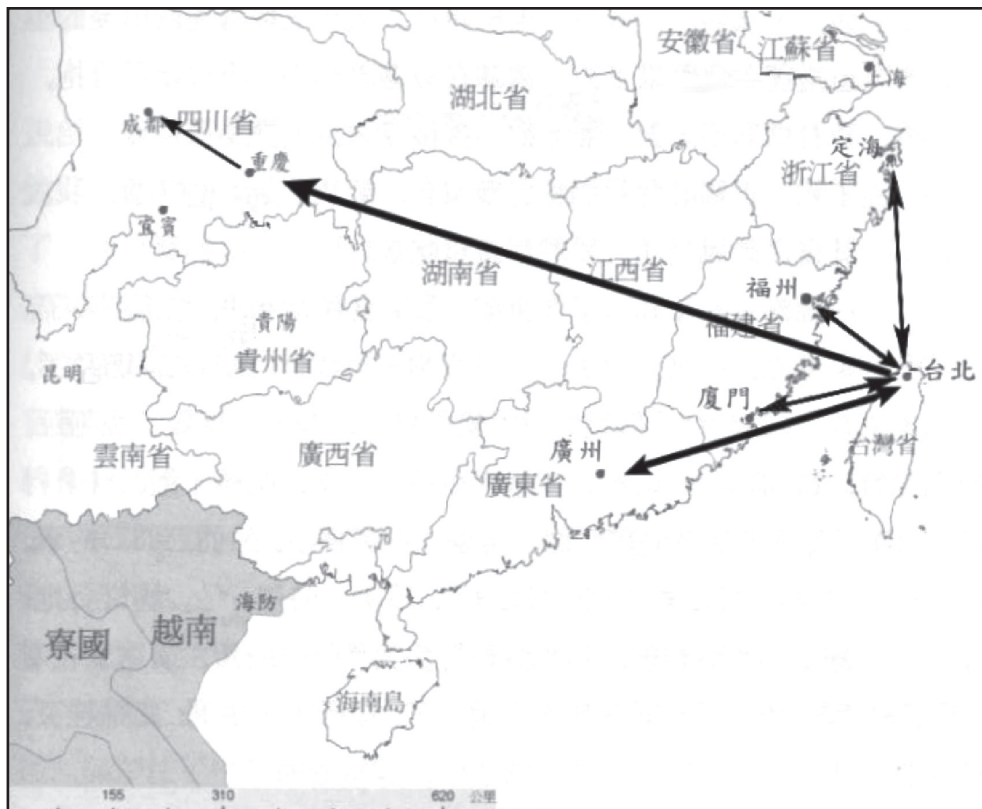
3月10日	袁守謙	3月11日	俞濟時、徐佛觀
3月12日	洪蘭友、唐縱、袁守謙	3月13日	俞鴻鈞
3月14日	俞鴻鈞、袁守謙	3月15日	任卓宣、沈昌煥、萬耀煌（南京中央訓練教育長）、熊笑三（陸軍第五軍軍長）
3月16日	徐佛觀、任卓宣、沈昌煥	3月17日	孫科
3月18日	王叔銘、湯恩伯	3月19日	湯恩伯、萬耀煌、徐佛觀、陶希聖、黃鎮球
3月21日	谷正綱、沙孟海	3月22日	沈君怡、倪文亞
3月23日	沙學浚、王叔銘、陶希聖、徐佛觀	3月24日	吳經熊、徐堪、陳誠、朱紹良（福建省主席）
3月25日	孔令傑、黃振球、朱紹良、陳誠、黃杰	3月26日	黃杰（湖南省主席兼綏靖司令）
3月27日	俞大維、朱國材、陶希聖、吳忠信、宋子文、鄭彥棻	3月28日	俞大維（交通部長）、唐縱（國防部保安事務局局長）、宋希濂、關麟徵
3月29日	張治中、宋希濂（湘鄂邊區司令官）、關麟徵（陸軍總司令）、吳忠信	3月30日	張治中、吳忠信、毛人鳳、郭懺、黃仁霖、張其昀、沈宗濂、洪蘭友（內政部長）
3月31日	袁守謙、谷正綱、陶希聖、洪蘭友、吳忠信、張其昀	4月1日	洪蘭友、吳忠信、沈宗濂、谷正綱、鄭彥棻、張其昀
4月2日	俞鴻鈞、陶希聖、谷正綱、葉秀峰	4月3日	程天放、蕭錚、陳雪屏、曹俊、王世杰
4月4日	程天放、蕭錚、陳雪屏、曹俊、吳國楨	4月5日	張媛、孫立人、吳國楨、王世杰
4月6日	毛人鳳、張媛	4月7日	張媛
4月8日	高吉人、董釗、張媛	4月9日	張媛、徐堪、江杓、鄭介民
4月10日	周至柔、胡宗南	4月11日	閻錫山、傅雲、季源溥
4月12日	朱家驊、陳啓天、居正、閻錫山	4月13日	居正、陳啟天
4月14日	居正、朱家驊、蕭萱、石鳳翔	4月15日	萬耀煌、沈德燮、盧鑄、孫連仲、居正、朱家驊、石鳳翔
4月16日	蕭芻秋	4月17日	鄭介民、王叔銘、朱世明、吳鐵城、朱家驊、居正
4月18日	吳鐵城（行政院副院長）、朱家驊、孫連仲、鄭介民	4月19日	張道藩、谷正綱、王世杰、蕭萱（芻秋）、朱世明
4月20日	張羣、吳忠信、湯恩伯、張鎮、胡宗南、趙隸華、張鈺	4月22日	李宗仁、何應欽、張羣、吳忠信、湯恩伯、王世杰杭州會談代表
4月23日	吳忠信、張媛、王世杰	4月24日	張道藩、谷正鼎、段澐、劉芸芝

資料來源：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第2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上海《大公報》，民國38年1月至4月。

附件二：蔣介石來臺路線圖



### 附件三：1949年下半年蔣來臺後進出臺海兩岸路線圖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

- 《蔣總統家書－蔣致夫人書信》。（《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 《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 《蔣總統引退與後方佈置》。（《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 《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省旅客入境出境辦法〉，檔號：233/002-02。（臺北，國史館藏）
- 《特交檔案》。（《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 (二) 專書

- 董顯光：《蔣總統傳》。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民國41年。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蔣公侍從見聞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6年5月。
- 司徒雷登、李宜培等譯：《司徒雷登回憶錄》。臺北：中央日報社，民國44年。
- 蔣經國：《我的父親》。臺北：正中書局，民國77年。
- 蔣經國：〈危急存亡之秋〉，《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第2冊。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71年。
- 張秉均：《中國現代歷次重要戰役之研究－戡亂戰役述評》。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77年。
- 陳存恭：《陶希聖先生訪問記錄》。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民國83年。
- 張其昀：《張其昀先生文集》，第十三冊。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民國78年。



程思遠：《白崇禧傳》。香港：南粵出版社，1989年。

程思遠：《李宗仁先生晚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12月。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1，民國67年10月。

胡春惠、林泉訪問：《祝紹周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國81年。

《陳誠先生回憶錄建設臺灣》（上）（下）。臺北：國史館，民國94。  
（石叟叢書）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2月。

基隆港務局：《基隆港建港百年紀念文集》。基隆：基隆港務局，民國74年。

### （三）論文

劉維開：〈蔣介石第三次下野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7期（2000年6月）。

秦孝儀：〈先總統蔣公與臺灣〉，《近代中國》，第31期（民國71年10月）。

王舜祁：《青少年時期的蔣介石》，《奉化文史資料》，第13輯。浙江：奉化市政協文史委員會，2002年。

薛化元：〈陳誠與國民政府統治基盤的奠定——一九四九年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為中心探討〉，《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

黃啟漢：〈一九四九年和談的回憶〉，《廣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九輯（1981年1月）。

